

实现东西部趋同的方案

窦尔翔¹ 韦苇²

(1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内容提要: 趋同理论、循环累计因果理论以及制度学派的理论为分析东西部差异的缘由及其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东西部差距形成的原因可以细化为: 区位因素、政策因素、体制因素以及科技因素。解决东西部差距问题首先要确定切实的趋同目标, 其次要探明影响而这趋同的各因素间的内在逻辑, 最终提出提纲挈领的解决方案。

关键字 趋同 东西差异 目标 方案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 A

1 趋同趋易理论的借鉴

如果将巴罗等人提出的 β 趋同理论、缪尔达尔为代表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以及制度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 可以为解决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其一, 缪尔达尔理论从空间生活的角度支持了西部赶上东部的“可能性”。不过时期较长: (1) 首先要靠市场的演化; (2) 赶超需要许多条件, 其中内含了政府的刺激作用。其二, 巴罗理论要从要素增长的角度为“西部可能赶超东部”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设法改变西部的“稳态水平”, 其手段中也内含了政策因素。其三, 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支持了“西部可能赶上东部”论断, 等于将“巴”、“缪”内含的政策因素必然化。

具体来看从以上理论所得到的借鉴:

第一, 西部与东部趋同的机理。东西部经济趋同或趋异取决于各自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高低及其边际收益率的增减趋势: 总体上来说, 资本收益率高, 则会吸引各种生产资源; 资本收益率低, 就会存在资源的背离倾向。动态来看, 区域资本收益率不是一成不变的, 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增)规律”。如果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 出现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 意味着产出增长率小于资本增长率, 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将随着资本要素累积的增加而递减。该机制会产生趋同的效应: 资本量相对稀缺的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 原因在于穷国更有动力去储蓄并获得同等投资下的更快增长。随着两地间可移动要素的流动以及贸易对要素价格和劳动者人均国内产品产生了均等化的作用, 该结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 上述理论逻辑将会颠倒过来, 地域间的不平等将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 趋同致因分析。引致地区趋同的具体要素包括:

①资本的支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 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于落后地区来说, 资本形成的多少及其快慢, 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对此,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 引起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是区域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必须采取措施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投资, 增加欠发达地区的资本供给。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张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 以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而达到与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②经济结构变动。库兹涅茨曾阐述过通过经济结构变动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特征: 农业部门在总产值或总劳动力中都趋于下降, 而工业

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缪尔达尔认为，商品和服务贸易对发达地区更为有利的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中心所从事的制造业，在贸易条件、产品结构及需求弹性等方面比落后地区的初级产品行业更具优势；赫尔希曼也强调政府应注意利用联系效应，选择前后联系效应大的行业，也就是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大的产业；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更是明确的提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ⁱ。看来，要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注重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

③技术进步。后进国家（地区）之所以后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生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和努力程度上比发达国家（地区）差。一般来讲，先进国家由于拥有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更先进的研究与开发条件、能力和经验，而始终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如果后进国家和地区不能提升自己生产或应用技术的能力，那么它与技术进步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差距就会一直保持下去；阿布拉维茨指出（Abramovits, 1996），如果后进国家有能力吸收和采纳国外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技术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会使后进区域用不着为前沿技术的开发耗费资源，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他们比技术领先者处于更有利的迅速增长的位置，技术赶超的结果无疑会导致趋同。当代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后来者会利用技术上的模仿优势。如日本和后期的新兴工业化和地区就成功的进行了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如果后进国家能进行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从而有效改变原来的结构特征，就会在技术上赶超先进国家，最终在经济上业后来居上。英国超越荷兰，美国超过英国即是例证。

④制度供给。巴罗、曼昆等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政策无关性”ⁱⁱ修正，为我国西部开发提供了“政府政策”干预的理论基础，发展金融制度（以提高“储蓄率”）等理论借鉴；无论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模型，还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也都认为单纯依靠市场规律的作用，只能造成不发达地区的进一步落后，必须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解决经济差距；赫尔希曼进一步把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概括为不平衡发展战略，认为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必须通过不平衡的新投资，才能抵消原来的不平衡以达到新的平衡；二元结构理论的代表刘易斯同样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必须制定一套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⑤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形成统一市场的过程，它既可能产生趋同也可能产生趋异：产生趋同的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加速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使两地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趋同而加快两地间经济区同的步伐。二是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区域间的收入差异是由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所导致的。经济一体化和商品贸易将借助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产生收入趋同；ⁱⁱⁱ趋异的产生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壁垒的取消，更方便于发达区吸收落后区域的各种资源。二是由于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递增，富裕国家或地区将始终处于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从而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⑥增长极的培育。以上空间经济理论都反映了经济中心或增长极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双重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由于各地区在区位、要素禀赋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是一种必然规律，这个规律自然也是用于国内落后地区。国内落后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也必须在资源总量和地区条件差异的约束下在区域内培养增长极，最终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增长，赫尔希曼提出了以“非均衡发展”解决“非均衡问题”的观点，佩伦克斯则直接指出要在欠发达地区建立发展极，在“极”内建立优惠政策并利用及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来实现整个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第三，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以上要素可按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iv}划分为三类：要素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要素。内在关系是：制度→结构→要素配置。其一、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受结构变动的影 响，在预期不足和要素市场分割及调整滞后的条件下，结构转变极有

可能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总量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结构变动问题。结构的有序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必要的条件，但其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况，要素组合结构的优化提升会创造更大的产出。所以，结构因素中内含了要素的量和要素的效率，任何生产都是若干要素加以组合，要素的存在为生产提供了前提，要素的充裕可以使生产打破瓶颈，而经济增长则依赖于要素组合效率的高低。要素是结构的物质内容，结构是要素的组合状态，二者相辅相成，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所统一；其二，制度是结构转化的内在变量，在结构主义观点中，结构转换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经济不足和要素流动障碍。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低度化，要素市场分割，价格扭曲现象极为严重。经济体无法获得形成有效激励和稳定预期的充分信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通过制度创新则可以改变市场的扭曲状态。实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顺利转移，从而实现有序的结构演进，促进经济持续，高效的生长。传统的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在预定制度下要素结构的转变，因而对制度轨转经济中的结构转变问题解释力有限。事实上，轨转中的经济结构转变不仅存在要素配置的非均衡，更主要的是存在更深层次的制度失衡。要素流动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围绕资源要素所产生的所有权结构的重组。一般来说，制度轨转通过两种渠道来提高资源利用率：一是市场需求张力，传统体制下，由于公有制的存在及需求的压拟，使大量制度闲置而未得到充分利用，改革则意味着产权细化及需求实现的自主化，全社会的资源利用率将得到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示的压力。由于市场机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竞争将自源从低效率利用部门（如国有企业）配置到高效部门（如非国有部门），从而使低效部门萎缩，高效部门兴起。

三者最重要的共同之点是：政策在西部开发中是极其重要的。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政策是制度变迁的着力点。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地区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⁹：

$$Y=F(R, St, I)$$

其中： $R=g(I)$ ； $St=h(I)$ 。式中假设：①结构转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②制度创新会促进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有序演进，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式中： Y 表示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 R 表示资源要素投入量； St 表示结构转变； I 是制度变迁。资源要素投入量和结构转变分别是制度变迁函数。

这里我们取 Y 做全微分，并将其两边分别除以 dI ，我们得到：

$$\frac{dy}{dI} = \frac{\partial F}{\partial R} \cdot \frac{dR}{dI} + \frac{\partial F}{\partial St} \cdot \frac{dSt}{dI} + \frac{\partial Y}{\partial I}$$

或者用另一种符号表示为：

$$\frac{dy}{dI} = YRR'(I) + YSS'(I)$$

如上式所示，自变量 I 的变化可通过三条途径影响 Y ：①通过函数 g ，进而通过 F 间接影响 Y ；②通过函 h ，进而通过 F 间接影响 Y ；③通过函数 f 直接影响 Y 。

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制度变迁不仅自身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促进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和结构转变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更多的要素投入，而且还需要通过结构转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制度创新为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为结构转变创造条件，并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

2. 东西部落差扩大致因分析

与东部相比，我国西部经济落差加大的原因主要有：

(1) 区位性因素。①西部区位优势。东西部的区位特征差异，构成了导致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最原始的初始条件和路径演化的切入点。这种区位优势表现为：首先，是西部自然地理落差。从地理位置来看，西部地处内陆，与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型国家接壤，而东部则与经济发达的港澳接壤，美日、泰、韩相望。从交通条件来看，西部多高山葱岭、地形复杂、地域广大，多以陆路交通为多，交通成本极高，而东部则河道密布、面临大海，交通成本很低。从生存的指标来看，西部海拔高而气温低、气温变化大、干旱少雨、生态环境差，而东部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更适于人类生存。从自然资源禀赋来看，西部资源、能源储量丰富，从而使西部被理所当然地定为资源开采及其初加工区，这类产业具有资金密集型、企业大型化、产业链条短等天然特征；其次，是西部的历史文化滞后。西部具有落后而封闭的宗教文化背景，不利于商品市场意识的渗透和扩大，而东部特具有实业强国意识和重商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注重亲缘群体的利益及内部关系的协调，人际交往往往以人格信誉代替契约合作，功利服从于亲情，且交往活动的空间范围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这些都对其在信誉短缺时期大规模的依托外资特别是港澳资金，带动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西部市场规模落差。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东部人口密集度最大，这是决定该地区市场规模的外延因素，另一方面，东部人口素质高，加之大量人才和劳动力由西部向东部流动，不但扩大了东部市场的外延，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东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扩大了东部的内涵型市场容量，为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而西部的情况则与东部刚好相反，不管从外延还是从内涵来看，西部市场容量都较小，不利于西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经济发展总是由内地到沿海，这已经是国内外都存在的历史规律。

(2) 政策性因素。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格局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1978年以前，我国实施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能源、原材料丰富的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从国内生产总值看，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但东、中、西部的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分别为34.9%、18.7%、13.8%，表明这种均衡发展是以效率的牺牲为代价的；1978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区域政策上以区位优势为基础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在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大进程中，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上的优势，被选中为优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行地区，从而直接促成了东、西两地的经济差距。其内容包括：①财政金融政策。一是投资倾斜政策。从1981年到1995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东部由45.91%上升为54.27%，西部则由17.49%下降到14.27%。“东升西降”的投资转移，对西部一些长期依靠国家投资特别是资源主导的地区产生严重的瓶颈效应。二是财税包干机制。在上缴中央财政基数基本不变的体制下，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所支配的财政资金比例更大，西部因此所支配的财政资金比例较小；②试验权政策。如在沿海率先实行开放政策。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是逐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推进的，1985—1995年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则只占4.2%，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缓解沿海地区建设资金的不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西部地区却在东部享受优先政策的背景下相对落后了。以放权让利为前提条件的改革开放措施首先在沿海地区获得试行，使东部获得了超前利益和“先发优势”，为其发挥“极化效应”奠定了基础；③政策利用程度差异。在改革政策上，东西部地区比较平等，但事实上，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的演化路径，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线，后者则是实际上的主线（周业安，2000）。西部地区享有改革政策，但由于

其落后的市场意识和封闭的思想意识，却不知如何加以充分利用，导致“政策放空”；而东部沿海却将改革政策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创造条件来演绎现有政策，即所谓的“政策创新”。以上差异，客观上使东部市场发育得更加充分、速度也更快，在优惠的开放政策作用下，市场的张力更大。④发展战略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东、西部分别实施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就产业政策来看，西部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实施重工业战略。而东部发展加工工业，实施轻工业战略。两种不同的战略，基本体现了东西两地的比较优势，大体是科学的，但客观上束缚了西部选择高端产业的自由度。加之国家对价格计划管理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中西部地区低价输出和高价输入的双重利润流失；二是在沿海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用配套优惠政策加以支持。沿海加工品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出口贸易迅速发展。⑤政策调控效能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放权让利和财政分权机制的作用，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使其在调控地区差距方面缺乏物质基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东部一方面私营企业占比较大，固定资产并不依赖财政投资，另一方面东部经济增长速度快，也有能力自我补偿。而西部的国有企业占比很大，自我积累能力又差，这使得西部的总体经济增长能力愈来愈低；同时，迄今为止我国还未建立起规范健全的区域协调机制，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区域协调政策效应并不明显。

(3) 体制因素。首先，东、西两地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结构有所不同。在新旧体制的双轨运行中，西部地区侧重于国有经济部门内计划外经济发展，国有经济的比例较大。而东部则更侧重于在传统体制边缘上的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两地制度创新的初始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开放之初，西部工业资产存量的绝大部分是“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依靠国家投资形成的，军事性较强。形成“西国企”现象，^{vi}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退出具有较强的强刚性特征。而东部的国有企业比重小，刚性小，使得东部沿海的制度创新的选择集比计划控制较严的西部地区相对更大，从而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空间就更大。非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及东部的非国有占比优势成为东部地区经济超前增长的重要原因；其次，与产权结构相联系，东西两地的市场化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已经实行一种准市场经济，现在已经处于后转轨时期。而大多数内陆地区仍然是计划占主导的经济形态，现在还处于双重体制摩擦的时期。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起优越性已为大家所知，在此主要想强调一下东、西两地的市场化差异对制度转轨成本的影响。一般来讲，制度转换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块：一是旧制度“拆迁”成本，二是新制度的建设成本^{vii}。前者主要指制度转换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补偿问题，利益补偿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不仅延长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而且有时由于尖锐的利益矛盾不得不放弃最优方案而选择次优方案。我国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东部沿海比西部内陆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东部不但其市场制度的建立成本比西部低，而且计划制度的“拆迁”成本也比西部要低。转轨成本的存在将使西部制度变迁的“时滞”延长，从而拉大了西部与东部经济增长的差距。

(4) 科技因素。戴维·S·兰德斯认为，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制度和文化的，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知识^{viii}。现实经验也表明，科技水平落后是制约后进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的最本质瓶颈，而科技进步会改变生产函数从而弱化和消除边际生产递减规律。东、西两地差距不断拉大，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东、西两地科技发展差距表现为：①总体水平极不平衡。观察综合科技发展指数，东部有6个省市属于高水平科技发展区（ $I_t \geq 150$ ），3个属于中上等科技发展水平区（ $100 \leq I_t < 150$ ）。西部除陕西属于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其余全属于低科技发展水平区（ $I_t < 75$ ），并有4各地区属于低水

平发展区($I_i < 50$)^{ix}。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最丰富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科技资源,西部情况则刚好相反。特别是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人群面临着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隔离的危险;②关键性科技发展能力指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距。东西两地的差距更显著的表现最为核心的获取科技能力上,其中又以国际收录论文指标差距最大,东西两地相对差异系数高达 279%,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超过 2300。网络经济有利于西部地区克服区位上的不利局面,西部地区却在以网络为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明显落后。在交流科技能力指标中,每万人口互联网用户指标差距最大,相对差异系数为 187%,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 259。1997 年,吸收科技能力指标中,每万人口中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西部只相当于东部的 64%,北京则是贵州的 14.4 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0%的省份全部在西部落后地区。实践已证明,科技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好的对应性。

3. 西部与东部趋同的方案

以上关于趋同趋异理论以及引致东西部差距的原因剖析为解决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提供了基础:

第一,趋同目标的选定。在短期内,条件 β 趋同^x是西部与东部趋同的可能选择。由于技术水平、制度、人们的偏好等等众多外生变量的不同,东、西部经济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结构特征,从而东西两地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不同的增长路径和稳态。而新古典理论关于经济体同质的假设不符合东、西部两地存在异质性结构的事实。即使从长远看可以出现绝对 β 趋同,也必须先在条件 β 趋同基础上运用巴罗、曼昆等人提出的“政策非无关性”原理,才能为绝对 β 趋同创造条件;由于 σ 趋同意味着各国或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绝对趋同, β 趋同就成为 σ 趋同的必要条件;而现实中,由于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往往会产生多重均衡增长路径,因此,即便是结构特征相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不一定收敛于同一稳态,最终的增长结果还部分的取决于初始条件。“群体趋同”也不适合于作为东、西部趋同的目标。

第二,改善区位优势状态。区位因素将通过其数量、质量、价格和在经济增长的逻辑位置来影响劳动力、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首先,区位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最原始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体制和结构状态相比,区位因素处于逻辑的上位,这是政府决定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战略因素。东部之所以有先发之机,与其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下,拥有比西部绝对优势的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其次,区位因素将通过经济障碍、社会障碍、法律障碍以及文化障碍影响个人的选择性。比如,东部比西部有更为灵活的房地产流动政策(经济障碍小)、更为灵活的户籍政策(法律障碍小),从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再次,与经济演化的阶段以及企业的组织和类型相联系,区位因素将通过其各子因素的丰裕度、质量和价格影响企业的选择行为。比如,在世界经济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致力于发展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东部在区位因素方面占有比西部绝对的优势。由此可见,改善西部的区位优势是解决西部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案之一。但有必要对区位资源进行细分,确认各子因素的改进性、流动性以及逻辑位置^{xi}。选择那些不易流动、处于逻辑上位以及可改进性强的因素作为西部开发前期的重点任务。比如,基础设施是其中处于逻辑上位、不易流动而又具有较强改进性的因素。

第三,政府政策。西部落后性决定了市场选择行为的“背离性”结果。要改变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必须借助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其内容大致包括:一是中央政府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区别”发展政策;二是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区域内部发展政策。需要强调的是,西部内部的发展及其战略的制定也应符合“协调非均衡”原则:既要培育增长极,又要注意协调发展。

第四,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西部,人口资源富裕,但在结构上大多偏

重文盲、半文盲和低层次人才，阻碍着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各个产业的吸收率，西部的劳动力战略在于加强技能培训；“起飞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的经济实践也证明了资本增长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西部资本投入至关重要。

第五，体制改革。西部国有企业的“强刚性”特征，决定了西部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善要在加大国有企业存量调整的同时，更多地倚重于非国有经济的培养，这是增强西部自我开发性的关键。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是发展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前提。特别是，西部资源丰富，实施公平合理的土地、矿山、山岭、草场等自然资源的有效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为“资源资本化”战略提供前提条件。

第六，结构改善。结构的改善可以带来TEP的贡献度。广义的结构包括体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产业结构。而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利用多种方式方法加速西部区域劳动力在本地内部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化。

通过上文的论述，西部开发的成功有赖于遵循以下逻辑：通过优惠的政府政策，实施西部制度变迁，启动更多的潜在资源进入市场，并进行经济结构的改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可见西部开发的过程，实质是提高西部资源配效率，提高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过程。

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素，表面上主要包括位以上六类，其实，其背后凭借的价值符号—金融资本的支撑。所以，西部区域发展因素可以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部分：“非金融因素”和“金融因素”。前者是实体经济要素，后者是实体资本的调动的工具；前者是经济增长途径和保证，后者是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和手段。这两种要素中，金融因素意义更加重大。这是因为：其一，金融因素是一切实体资本的代言人，有了金融资本，就拥有对实体资本的调动权，就有了实施政策保证、制度转化的加速器、结构调整的工具。其二，对于实物资本来讲，对于已投入的资本，事实上是不可流动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流动会引致高额的迁移成本。而相对来说，金融资本更易流动，成本更小。在这种情况下，等于将实体资本的流动性转化成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当然，此时，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取决于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系方式、转换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其三，下文将看到，金融时代，金融功能不断丰富和增强，金融具有了资产功能、调整功能和消除风险功能，体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区域倾斜政策的实施等都有赖于金融功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 ¹ 参见阿瑟·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载《不发达经济学》1973年英文版。
- ¹¹ 参见邓翔：《经济趋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¹¹¹ 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了著名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认为，自由贸易不仅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以致无论两国的要素供给和需求格局如何，两国的劳动者都将得到相同的工资，单位土地都将获得相同的地租。转引自邓翔：《经济趋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¹¹²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理论、一种是结构主义观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设下，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增长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所谓竞争均衡是指经济制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供求双方资源都达到了长期有效配置，即帕累托最优。这意味着部门间的要素流动不可能增长总产出，也即不存在任何结构效应。由于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机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均衡调整。新古典理论的竞争均衡假设是有缺陷的。参见沈宏达：《经济结构三维模式——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优化与调整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 ^v 参见沈宏达：《经济结构三维模式——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优化与调整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20页。
- ¹¹³ 根据投资来源和企业体制，学者将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划分为“北国企”与“南国企”。“北国企”主要

指改革开放以前建立的，又称“老国企”。“南国企”指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或国有企业和政府担保贷款新建立起来的、并由这些新企业归还了贷款的国有企业，又因多集中于南方，故称为“南国企”或“新国企”。这两类企业不仅资金来源不同，运行机制也不同。前者实施计划机制，后者则按市场机制运行。西部国有企业在大的方面也属于“北国企”，但其自身还有一些很不同的地方，多为由东北和沿海搬迁过来的军工企业或军工企业的配套企业。因而其产业带动能力差、积累低、产权改革和退出很难，并形成了独特的不利于改革的企业文化观念。参见刘世庆：《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ⁱⁱⁱ 参见陈述：《现代化区域进程论》，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62页。

ⁱⁱⁱⁱ 邓翔：《经济区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ix} 胡鞍钢、熊义志：《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和对策》，《管理世界》2000.3。

^x 趋同目标共有四种：一是绝对 β 趋同（absolute or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其含义是指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富裕的国家或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将收敛于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 β 趋同的成立有严格的条件假设，即经济体之间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特征，包括投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生产函数，因而也具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均衡稳态。在此特征完全相同的群体中，某个经济体的增长率与其距离稳态的距离成反比；二是条件 β 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认为由于许多外生变量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经济体也就具有异质结构特征，以及不同的增长路径和稳态，每个经济体都收敛于自身的稳态。所以条件 β 趋同所考察的是，如果外生变量保持不变，初始收入水平与增长率是否负相关；三是 σ 趋同（ σ convergence）。指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缩小；四是群体趋同（club convergence）。指结构特征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长时期相互趋同。参见：邓翔：《经济区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xi} 在各种区位因素中，决定和派生其它因素的因素，称其处于“逻辑上位”。

Achieve the settlementscheme that the thing ministry hurried along in common

Dou re xiang¹ Wei wei²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 business academy Xi'an 710062 , Xi'an 710069)

Abstract : Hurry along with theory 、The cycle adds up that the reason that cause and effect theory along with system school theory are analysis thing ministry divergence reaches such The settlement scheme supplyd the significant theory reference , The reason that the thing ministry disparity takes shape may be carefully divided : Zone bit element 、Policy element 、System element alo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ment 。 Resolving the thing ministry disparity issue first of all willfix hurrying along with the target of practical , Such is less importantly verified the effect Intrinsic logic between every element that but this is hurried along in common , Finally propose the settlement scheme that the neck was takied along to the outline 。

Keyword : Hurry along with the thing divergence target scheme

收稿日期：2004-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中国城乡贫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2JAZJD790010

作者简介：1. 窦尔翔（1967.12）男（汉族），陕西周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2. 韦苇（1948.7），女（汉族），陕西户县人，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